

珠寶漂流記：《伯爵夫人的耳環》一書中物品情感與商品邏輯的衝突

林德祐* / Lin Te-Yu*

國立中央大學法國語文學系 副教授

Department of French,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摘要】

《伯爵夫人的耳環》(*Madame de*)是法國女作家薇慕韓(Louise de Vilmorin)於 1951 年發表的小說，篇幅不長，結構縝密，語言細膩，評論家皆認為此小說具有古典小說典雅的特質。故事敘述女主角由於積欠債務，私下變賣了一個結婚時的首飾，事後為了圓謊，引發了一連串珠寶輾轉交易的過程，最後女主角陷入了丈夫與情夫之間兩面困窘的處境，引發誤會，悲劇收場。本文擬從物品象徵的情感與商品的交易邏輯兩道軸線探討《伯爵夫人的耳環》一書中物件在人際關係之間的輾轉交流背後蘊含的意義。

【關鍵詞】

薇慕韓、伯爵夫人的耳環、物品情感、商品交易邏輯

【Abstract】

Madame de, is a middle length novel of the French novelist Louise de Vilmorin, written in 1951, with the deliberate structure and the refined language. The criticism estimates that the novel is a classic with its elegance. The story describes the countess sells secretly a pair of her earrings of her marriage to finance her gambling, therefore, in order to cover the lie, she has encountered a series of the consequences caused by the commercial circulation of the jewelry. Finally, the countess has fallen into the dilemma of misunderstandings between her lover and the

*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系副教授。

*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husband, hence the story ended up as a tragedy. This article tries to discuss the objects as symbolized sentiments and their commercialization as two main circuits of analysis to discover the hidden meanings of the objects' circulation between human relation in *Madame de*.

【Key words】

Louise de Vilmorin , *Madame de*, objects as symbolized sentiments, objects' commercialization

前言

法國人類學家巴贊（Jean Bazin）專門研究物品在人類社會之中的關係。雖然她研究的領域比較是人類學與社會學，但他也相當推崇文學具備的知識與經驗論功能。他認為，小說敘述非常適合放入物品的歷險記，文本中的敘述正好可以提供讀者探看物品遞轉易主的路徑。就這位人類學家而言，行動者（或施動者）可分兩種：「第一種是物品本身，物品一旦拋擲到餽贈和反饋重複往返的空間之中，便展開一連串讓手、轉手的歷程，展演出從一座島嶼換過一座島嶼的路徑—小說的描述可說是以物品作為主角；第二種行動者是人類，他們彼此敵對，相互干擾，互不相容，熱衷於繁複的操弄手段（誘引、恫嚇、餽贈與修辭……），企圖置身到物品輾轉的路徑之中，試圖暫時擁有某物，享受賞玩某物的樂趣」（Bazin 22-23）。換言之，物品本身並沒有自身的價值，而是透過加諸在物品的一系列的行動，如佔有、交換、使用，或透過評價、評估等行為而衍生出來，多少從屬於歷史或社會脈絡的衡量。這也成為社會學或人類學學者關注的課題，例如研究物品的珍貴性如何形成，珍貴性又如何特別出現在某些物件之中。事實上，物品的珍貴價值往往來自其背後，穿梭在人類與社會之間錯縱複雜的路徑。

本文試圖從上述物品價值與敘述的觀點出發，研究法國二十世紀女作家薇慕韓（Louise de Vilmorin）的小說《伯爵夫人的耳環》（*Madame de*, 1951）¹，探討物品的意義如何在人物的社交與商品交易之中不斷分裂，回過頭來顛擾人際關係。這部作品獨到之處就在於，作者安排了一連串物品的轉手與折返，拓展出一系列的情節，譜成故事的架構，物品的重要性比起人物有過之而無不及。雖然小說是以女主角的稱謂作為標題²，但是真正的主角可說是一對鑲著心型鑽石的耳環：小說標題雖然指向女主角的傳記、小史，但是從情節內容來看，更可以視為這對首飾一段曲折離奇、輾轉反覆的冒險路徑。³在小說中，許多時候，敘述者甚至把這對珠寶提升到主詞的位置：它們「訴說著」（27），它們「召喚著」（28），就連書中人物也都驚覺這對耳環某種「自主性」，其中一個人物

¹本文研究的小說之標題採用國內對該片片名的中譯：《伯爵夫人的耳環》。

²法國小說中以女主角的名字或稱謂作為標題其來有自，十七、十八世紀的小說家特別喜歡採用女主角的名字為標題，如拉法耶特夫人（Madame de Lafayette）的《克萊維王妃》（*La Princesse de Clèves*）、《蒙邦希耶公主》（*La Princesse de Montpensier*）或杜菲（Honoré d'Urfé）的《阿斯特來》（*Astrée*），也因此薇慕韓的小說原標題《某夫人》（*Madame de*）暗喻貴族社會，似乎有意要放置在這一到古典時期的文學脈絡之中，同樣的矯飾風氣與注重集體表相，同樣的崇尚名流文化。

³從這裡也可以理解為何電影版的中文譯名：《伯爵夫人的耳環》，反而聚焦在物品本身，而非女主角本人。

發現物品又折返原地時，還打趣地說：「好東西會挑顧客，會幫自己找到好人家」(34)⁴，頗有「良禽擇木而棲」主動尋覓的意味。這對耳環可說是小說中真實的人物，透過它們在人物手中轉出轉入的路徑，串聯出許多小插曲。物品原本是身外之物，然而在小說的詮釋下，物品逐漸反賓為主，重要性甚至凌駕了人物，彷彿相形之下人物反而淪為被動，受到物品擺弄。

一、矯飾風的寫實視野

薇慕韓的這本小說出版於 1951 年，當時文壇已經不再是以莫里亞克 (François Mauriac) 的心理分析小說為主流，甚至任何與古典主義相關的創作都很容易被貶為過時、食古不化。1950 年瑪哈絲 (Marguerite Duras) 出版了《太平洋水壩》(*Un barrage contre le Pacifique*)，再往前推，1948 年，莎侯特 (Nathalie Sarraute) 出版了《陌生人肖像》(*Portrait d'un inconnu*)，這些書寫都具有顛覆傳統的特性，不但不是以心理分析見長，甚至書寫的本身也暗含對傳統文學的反諷或挖苦。

然而，薇慕韓似乎反其道而行，甚至變本加厲。小說延續法國十七世紀的小說文學傳統，語言刻意採取古典主義時期的典雅矯飾風，含蓄婉約、風格凝鍊，從小說情節的安排，又可看出典雅的語言包裹著澎湃的情感，以微妙的布局傳遞迂迴、變動的人際關係，表象與本質的差距，像是一本微型的《危險關係》(*Les Liaisons dangereuses*)⁵。小說並未明確交代時代與背景，時間與地理的線索闕如，然而讀者依然可以找出真實的指涉，足以想像可能的環境，小說內部具有自成一格的一致性、合理性、邏輯性。結構主義以來，文本的線索成為理解小說世界的重要線索，有時甚至與作家或自傳式的外部社會脫離，自成一格，但我們必須承認，有些小說家賦予虛構作品一種完整的社會意義。即便說，薇慕韓刻意要淡化小說中的歷史或社會的連結，切斷與真實界的銜接，致使我們無從將文本放入某種社會學的視角來研究。一個文學作品若能為社會學科帶來啟發性的價值，前提就是，該作品中的主題或主體，必須立基於一個自真實中提煉出來的脈絡框架之中。舉例來說，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的《追憶似水年華》(*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之所以能夠引起社會學式的論

⁴本文關於《伯爵夫人的耳環》的引文採用巴黎 Gallimard 出版社再版的袖珍叢書，有些引文的中譯則採用了胡品清收錄於《秋之奏鳴曲》的譯文。

⁵ Marcel Arland 為這本小說寫書評時就把《伯爵夫人的耳環》與《危險關係》相提並論，同樣都是在優雅的背後暗藏危機。

文研究，正是因為小說中隱約涉及了 1880 年到 1920 年這段期間法國貴族與資產階級深層的社會變動。普魯斯特的小說共同指向了一個明確的歷史背景，有真實的歷史事件為依據，例如「德雷福斯事件」(L' affaire de Dreyfus) 正可作為其與真實連結或定位的中介。

然而，在《伯爵夫人的耳環》中，女作家似乎刻意淡化時空背景，不明確指出時代與地點，讀者只能依賴某些線索或物件，按圖索驥，隱約揣測故事有可能發生的年代與城市。從物品或空間的呈現，交通工具、建築物、服飾或家具裝飾物的描述，可以推測大約是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交界的期間。地理上來說，讀者能夠掌握到的大概是：故事發生在歐洲，不知道哪一座城市，只知道這是一座大都會，可以發展出這樣繁複多彩的社交生活，有高官或各國大使出入（電影版直接把城市設定為巴黎）。從女作家的傳記生活來看，女主角的許多特徵都與她極為相似：經常出入社交圈、高貴的氣質、卓越的品味，是名門之後，就連個人情史也相當豐富。許多女作家的傳記都將她描繪成「情史豐富的魅惑者」(une séductrice aux passions nombreuses)。⁶

由於女主角沒有真實的命名、城市或時代也未具體明示，作家似乎賦予她的小說一種普遍、普世的特徵，小說本身試圖傳遞的訊息也是對人性或人際關係的沉思：虛榮、表相遊戲、愛情關係的脆弱性、社交生活的繁瑣。小說一開始作者採用格言體的句法寫成獨立的一段：「愛情，不論它的年紀有多大，凡它所觸及的事件總是顯現出一種與現在相關的特徵」(12)，正強調愛情與人際關係永恆不變的面貌。因此，要如何理解作家為何不明確地點出時代與空間背景？她並不是要賦予小說某種神祕遁世的色彩，而是提供小說一種普世典範的價值。

雖然歷史背景脈絡不明，但是作者的影射還是可看出一些社會寫實的面向，小說中涉及的場景其實就是作家本人最熟悉的貴族名流與資產階級社會：

伯爵夫人姿態優美，也是服飾最典雅的女人，而在那個社會中，一個女人的成功與名望不僅有賴於姣好的面容，更有賴於服飾的華麗……凡是她選擇的東西，都具有一種新意義，一種新的重要性。她有創見，她發現別人覺察不到的東西，她令人讚嘆（薇慕韓 13）。

⁶ 關於薇慕韓的傳記，可參考：Jean Bothorel 的《路易絲·薇慕韓的生平》(*Louise ou la vie de Louise de Vilmorin*) (Grasset, 1993)；Geneviève Haroche-Bouzinac 撰寫的《路易絲·薇慕韓一波希米亞的一生》(*Louise de Vilmorin Une vie de bohème*) (Flammarion, 2009)。

故事的背景是法國的上流社會，講究典雅的品味，人物過著奢華的生活。女主角擅長交際，舉手投足皆能成為時尚的指標。即便小說沒有明確的標示出社會環境，書中的背景呈現出一種典型的「馴化的世界」(monde domestique)，一切講究合宜、得體，尤其注重集體社群的呈現與人際關係的維持，追求崇高卓越也成為社會網絡建立的符號象徵。小說中大使這號人物的行為舉止也幾乎都是建立在禮儀、合宜的典範之下，而這種禮儀的行為有時甚至可變得殘酷。例如後來大使與伯爵夫人鬧翻了，但是在公開的場合依然會碰面，兩人依然必須出席，大使依然能夠運用一種不愠不怒的姿態與他寒暄，卻不願聽任何的解釋。

二、珠寶的選擇

女主角是一個貴族名流的妻子，瞞著先生在外面負債累累，自尊心作祟之下，不敢向丈夫說出真相，為了自行解決負債，她決定偷偷變賣一份珠寶。故事的起始源自這場珠寶的變賣，珠寶的轉手決定了人物的命運，同時也改變了物品本身的命運。小說中的夫妻關係是建立在一道嚴格的社會等級，雖然是夫婦，伯爵與夫人之間的關係並非建立於情感之上，他們的婚姻是一種社會地位的維繫。伯爵先生家財萬貫，對妻子的儀態與社交場合的表現感到自豪，也因此對她的開銷從不過問，正因為這樣的信任感，致使伯爵夫人債台高築時，也不願開口向她先生要錢，自尊心與虛榮心作祟，無計可施的絕境下，她才想到要鋌而走險，偷偷變賣一個價值不菲的珠寶，來解燃眉之急。

值得一提的是，女主角選擇要變賣珠寶時，作者運用了內聚焦的敘述手法，讓我們可以瞥見女主角內心的想法與顧慮：「(伯爵夫人)打開了她的珠寶箱，覺得賣掉一件家族的珠寶是不謹慎的行為，一大宗價值較廉的珠寶不翼而飛，也是解釋不過去，所以她決定賣掉一副耳環，那副耳環璀璨明亮，而且匠心獨具，由兩粒心形鑽石鑲成」(14)。這段描述也讓我們看見，不同層級的物品之間數量比例的關係：一個傳家之寶必須要一大批其他珠寶加總起來才能價格相當。另外，雖然敘述者也描述了女主角在選擇珠寶時的萬般掙扎，故事後來的敘述卻也讓我們意識到，再怎麼昂貴的珠寶，它與其他的珠寶依然具有同質性或可互換的性質。伯爵夫人雖然變賣了耳環，也在舞會現場上演耳環失竊的戲碼，可是後來為了平息媒體大肆報導造成的困擾，不讓竊盜案疑雲甚囂塵上，趕緊又帶了一副色澤或樣式旗鼓相當的首飾，成功地瞞過眾人的眼光，令

賓客相信珠寶已尋獲。「伯爵夫人的珠寶匣有大量的珠寶，她可以隨心所欲穿戴珠寶。當晚她就配戴了另一個家傳珠寶，光澤與等級都與報稱失竊的那一對耳環不分軒輊」。(20) 換句話說，伯爵夫人選擇變賣的，其實並非獨一無二的珠寶，品質或數量上來說，都可用珠寶業的品味與標準來理解。在眾多珠寶首飾之中，哪一個才是多餘的？為何這對耳環被指定為多餘？如果這件珠寶和其他首飾盒中的珠寶具有同質性或可互換性，那麼唯一特出的地方則在於它原初的背景，「那是她丈夫在他們結婚的第二天送給他的一件豪華的禮物」(14)。換言之，伯爵夫人居然同意拋出這副對她來說應該別具意義的耳環，或許作者藉此暗示，夫妻兩人的感情早已名存實亡。

以故事中的社會秩序來看，賣掉一份家傳的珠寶是「不謹慎的」，相當於賣掉一大批為數可觀。家傳的珠寶，可說是一種不可變賣的珠寶，或是一種不可毀損的資產。人類學者就曾經指出，在某些特別講究交換規則的社會中，有些東西是絕對不可動的，因為這類物件關涉共同身分的維繫與個人與群體的識別，家族的珠寶正是屬於這種不可毀損的物件。

透過女主角選擇要變賣珠寶的這一場景，作者讓我們看見人類對物品的依賴，以及物品在個人與群體之中引發的效應。女主角之所以選擇扔出這對耳環，那是因為這個物件對她而言，情感價值已經蕩然無存了，而且她覺得沒有義務要保留這對耳環；從社會層次來看，私人情感與家族義務都已經喪失。對她而言，這是一對多餘的珠寶（雙重的無用），不再具有任何情感上的眷戀，因此可以轉換成金錢。然而，如果耳環的價值因此淪為交換的價值，並非是由於物品本身的特性或質變，而是物品與它的擁有者共同經歷的歷史與遭遇引發的行動所導致。作家似乎區分了商品與不可毀損物品的差別，這樣的區分也並非絕對不可變動或不可逆轉。這裡涉及的問題並不是社會交易框架下的可賣、不可賣的問題，而是個人在乎、不在乎的區別，不被在乎的就是多餘。

三、輾轉耳環

決定要變賣心型耳環之後，女主角去找他們家的珠寶商，就是當初丈夫買入鑽石耳環的那位珠寶商。而且女主角也預先想好，刻意上演一段戲碼，讓珠寶的不翼而飛變得合情合理。伯爵夫人利用參加舞會的場合，製造耳環意外弄丟的戲碼，讓丈夫以為珠寶確實不見了。然而，這場珠寶遭竊鬧得沸沸揚揚，而且又是發生在上流社會的公開場合，自然變成報紙的頭條。珠寶商見報後也

意外地變成了握有「贓物」的竊賊。為了擺脫窘境，珠寶商不得不登門造訪伯爵先生，告訴他事情的來龍去脈，並請他將珠寶買回。伯爵先生買回了珠寶，順勢送給了一位主動求去的西班牙裔情婦，她正準備返回南美洲，作為分手的禮物。

其實在這本小說中，伯爵先生可說是最不在意物品商業價值的人：生活優渥，出手闊綽，物質無虞，金錢對他而言從來不構成問題。最初就是他買下了這對昂貴的耳環，送給他的妻子當作新婚贈禮，隨著故事的發展，也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買回這對珠寶，而每次的買回（贖回）都是純粹是在「撒錢」。花錢買同樣一件物品，買了幾次就花了幾次錢，沒有任何一點回收、回饋，這樣的舉動無異於切斷物品的商業交易價值，而且每一次的交易對象都是同一位珠寶商。從這個物品的轉手路徑來看，可以發現物品彷彿具有一種虛構的特性，許多文學作品都不乏以物品的轉手、流轉最為敘述的驅動力或敘述邏輯⁷。然而這當中也可以看出物品具備的社會邏輯：重要的不是物品的價錢，不是經濟上的損失，而是物件在社會空間中所扮演的角色：這對耳環必須體現伯爵夫人的高貴與典雅，同時也間接地迴映出丈夫的崇高、卓越、無與倫比。伯爵先生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不惜代價買回珠寶，這正顯示，對他而言，必須避免珠寶的消失或出現在不恰當的地方，招惹來的流言蜚語、閒言閒語，進而危害名聲與威望，也破壞了夫婦的形象。珠寶商第四次上門前來請伯爵先生買回珠寶的時候，也是一語道破這個面子的問題：

「我考慮到，別人看到這對珠寶時，」珠寶商說，「可能會誤以為你們有甚麼困難，不得不把這對耳環賣掉，所以我就不請自來了」。

「你的顧慮完全正確」。伯爵先生回答。語畢，他第四回買下這對珠寶，珠寶商也因為第四度賣掉珠寶感到抱歉。兩人握了握手，就這樣，兩人因為捲入了這場珠寶歷險記，注定以後還會再相見。
（薇慕韓 55-56）

⁷法國十九世紀的短篇小說大家莫泊桑（Maupassant）也曾經以真假珠寶的題材，撰寫短篇故事一則。評論家 Alexandre Péraud 亦發表過類似的論文，從三本不同世紀的法國文學作品探討珠寶在敘述邏輯中牽動的情感與經濟意義，這三本小說分別是：1698 年杜菲尼（Dufresny）的《鑽石的冒險》（*L'Aventure du diamant*），1829 年巴爾札克（Balzac）的《家庭的和睦》（*La paix du ménage*）以及本文探討的《伯爵夫人的耳環》。

換言之，珠寶其實與擁有者的社會地位有關，是這道價值體系決定了它的特徵或身分。如果從工業化資本主義的角度來觀看這種「純揮霍」的交易，伯爵先生的行徑可能會顯得荒謬、不合理，但是我們必須從傳統貴族的理性邏輯來看待物品與人的關係，才能理解伯爵先生對物品的考量：如果一個社會的存在真實是建立在財務與專業的功用之上，對它來說，物品的確只是一些瑣碎的事物，無用之「餘」，然而在宮廷的社會之中，這些瑣碎、多餘的物件正體現出社會存在的表象，傳遞出每個個體在社會等級中所處的地位。(Elias 84) 小說的背景當然不是十七世紀的法國宮廷社會，但是小說的敘述卻讓我們看到一種貴族的理性真實與資產階級的對立與差異：貴族害怕喪失地位或形象，商業人士害怕失去金錢。「之所以如此看重地位，自己的頭銜，這並不是一種對表象的追求或只愛追求表面功夫，對宮廷的人而言，這是在確認自己符合個人的身分」(Elias 94)。因此，伯爵先生的行徑顯示，物質金錢的損失事小，名聲毀損才是他真正擔憂的。對他而言，錢是無關緊要的小事情，佔有珠寶才能維持他的地位和身分。耳環珍貴的特徵，並不是在於它在交易買賣中可以價值多少錢，物件之所以貴重，並非在其物質特性，而是在它牽動的社會名聲與地位。

四、定情之物

西班牙情婦回到了南美洲之後，流連賭場，最後必須變賣掉伯爵先生的分手禮物，心型耳環。耳環在櫥窗發光不到幾個小時就被一位正準備動身前往法國的大使買下。這位新上任的歐洲大使在餐會上認識了伯爵夫人，兩人一見如故，開始有一些私下的約會，但也沒有到需要避開伯爵先生耳目的地步。兩人漸漸陷入戀愛，大使後來終於把心型耳環送給伯爵夫人作為定情之物：伯爵夫人看見這對珠寶，驚訝感動之餘，也沒敢對大使說出耳環背後的真相。

故事展演至此，禮物出現了兩種範疇的區分，不見得是建立在物件的本質（珠寶的純度），而是物品價值的呼應。大使想要送給伯爵夫人兩種範疇、兩種類型的禮物：

聖誕節的那一天，你會收到我送妳的禮物，我送妳的紀念品，表面上沒有價值的，一個丈夫可以允許自己的妻子從男友那邊接受的小禮物。可是我現在送妳的這份禮物是我們之間愛情的信物，因此它

是純潔無瑕的、無與倫比的，不該公開的。(薇慕韓 26)

「你瞧這兩顆心，」他繼續說，「這是我們的心，保存它們，隱藏它們，尤其是把它們混在一起吧！我很高興能夠送妳一件只有我們單獨相處時才能配戴的飾物。」(薇慕韓 26-27)

這一對心型耳環的價值似乎與其他珠寶有所區隔，而它的價值正顯現在與其他珠寶的對照中才顯現出來。但是這裡涉及的並非珠寶商業往來的價值。

物品因為這場餽贈而變得「貴重」，伯爵夫人欣喜地收下這份禮物，甚至還希望能夠公開地配戴這對耳環：「我不願被剝奪因面對全世界戴著這珠寶的驕傲的權利，也不願被剝奪因聽見兩顆心在我耳邊講你而抒發的情感」(薇慕韓 27)。之前珠寶是多餘，現在珠寶躍升為主角。

兩顆心在她的耳邊「講話」、「呢喃」、「喋喋不休」……物品變成了故事的演員！到目前為止，這對耳環並沒有因為誰而特別「珍貴」；到目前為止，這對耳環似乎沒有足夠的象徵意涵蘊藉其中，始終無法擺脫被變賣、被轉手的命運，彷彿最初的「多餘」，不斷複製出後來的「多餘」。然而，就在大使把耳環贈送給伯爵夫人之後，從這一幕起，珠寶的命運有了轉折：珠寶被注入情感，承載著情意，變成愛情的信物，有別於一些時節應景的禮物。然而，這劇情上的轉折卻是建立在一場謊言之上，因為伯爵夫人避而不談珠寶真實的過去，也因此預埋了接下來一發不可收拾的誤會。

五、從秘密到公開化

失而復得，伯爵夫人對於這對耳環自然愛不釋手，更何況這珠寶如今成為愛情信物，她於是又在丈夫面前上演一齣意外尋獲耳環的戲碼，然而，伯爵先生認出這對耳環，馬上就推測出大使與妻子之間可能的戀情。為了拯救名聲，他單獨會晤大使，告訴他原委，並要求大使將珠寶賣給他的珠寶商，他會再將珠寶贖回。重新買回珠寶之後，伯爵先生彷彿是要處罰妻子的漫天謊言，強迫她把珠寶送給一位姪女，她剛生產，這對耳環剛好可以變成一個祝賀別人喜獲麟兒的禮物。

作家敏銳的地方在於，她演繹出一段物品隨著情境，一下子載入、一下子釋出的路線，從物品的擲出與回返勾勒人物變動的情緒。一開始是將珠寶脫

手而出的坦然，接著又是重新獲得珠寶的喜出望外，接著又要面臨珠寶被剝奪的鬱鬱寡歡，物品自然牽動著人物的情緒，但是作家敏銳之處在於，讓同一物件，在不同的情境，催引出擁有者不同的情緒。作家串聯了許多的意外、巧合、偶發事件，虛構的發展不外乎將這些意外、偶然串聯起來。小說中每個人物關於物品轉手的歷程都有一個環節是他們不清楚的：沒有一個人物能拼湊出完整的珠寶歷險記，這個空缺在人際關係間產生了誤會，強調了人際關係與物品價值之間不可化約的關係。從大使送珠寶給伯爵夫人，到後來伯爵夫人被迫轉贈珠寶給親戚，此間這對耳環蘊含了雙重、甚至多重的意義：既是秘密戀情的信物，也是謊言的證據，婚外情的呈堂證供。每個人物都只知道一部分關於珠寶的漂泊史，每個人對於珠寶都抱持著一份只關乎自己的感覺，就像女主角自己的陳述：「即使我買回了這對首飾，我還是不能配戴它，它蘊含著一個只有我自己知道的真相」(50)。

一直以來，珠寶都是游移在私密領域之中，如今透過公開的饋贈，一種剩餘的物件轉變成神聖的物件，從夫妻、戀人之間的物件，轉變成公開、公諸於世的物件。作家還特別佈置了一段儀式性的場合，讓珠寶正式脫離原本私密、個人的層次，轉變成公開的禮物：

一見到伯爵先生和夫人進來，大家都用親切的寒暄招呼他們。有一再的握手禮，有女士們之間的互吻。大家讚賞嬰兒，然後伯爵夫人俯身向她的姪媳，在耳邊低語，把她帶來的禮物塞在手裡。那年輕的母親開了匣子，驚喜地叫了一聲。在場的人全都輕輕地讚美並道謝，俯身向那天起變為家傳首飾的鑽石（薇慕韓 30）。

這樣的安排自然也是對女主角的撒謊的懲罰：她不但被迫與這件耳環分離，而且還必須在眾人面前，事與願違地與耳環分離，讓耳環進入到公開、公眾的空間之中，進入到一種表象的空間，炫耀的空間。在這樣的社會空間場景中，透過公開的饋贈儀式，物品進入到更崇高的範疇，變成傳家首飾，也同樣地撤出了交換體系的網絡。在這個社會中，與物品脫手多少都是逾越一種不成文的社會規則。

同樣的一個物件，在兩個不同的時間點，有了不一樣的觀感。由此可知，所謂的範疇並不是完全不變的，而是來自一種建構之中，物品也正是透過它所累積的內涵而尋獲自己的定位。換言之，沒有哪一件珠寶就是傳家之寶，傳家

之寶不是天生的，而是變成的！

六、物品的殘餘內涵

大使與伯爵先生晤談之後，恍然大悟，了解那對耳環的真相，發現自己追求的戀人竟然欺騙了他。心痛之餘，他決定疏遠伯爵夫人，終止兩人的關係，此事讓伯爵夫人陷入悲傷之中。

作家很清楚地讓我們看見，物品的象徵意義遠遠超過其經濟的價值，物品所衍生出來的價值遠比其原本的效益還要大。令大使痛心的，並不只是因為伯爵夫人對他說謊，而是在於這對耳環既是他們兩人的愛情定情物，同時也鑲著前一段感情的記憶。「你不是曾經毫無恐懼地接受了我一件含有你全部的過去的禮物嗎？」（薇慕韓 32）對大使而言，物品承載著這兩種內涵是無法折衷或相容的，一段是婚姻制度的愛情，是因利益結合的愛情，一段是真正情投意合的熱情。「當他確知伯爵夫人並不在乎把他倆的回憶和其他會傷害他的回憶混在一起的時候，他就覺得心裡的愛一瀉而空了」。（薇慕韓 32）物件超載著兩種記憶，而這兩段記憶彼此卻是全然矛盾或對立，作者似乎就是在這個矛盾之中尋找劇情的張力。

伯爵夫人的回答也讓我們看見，把物品轉變成商品時，銘刻在上面的意義已經消逝了。「我不再有過去！我只執著於你。那首飾，我不是把它賣掉了嗎？」（薇慕韓 43）。賣掉一個物件，意味著我們不再重視附著在上面的記憶，伯爵夫人不正毫無遺憾就變賣掉那一對耳環嗎？而且也從而轉換了物品的層次，將物品投擲到商品交易的路線中，買賣交易的性質凌駕了情感的屬性。賣掉了珠寶，也就是把物品放置到商品交易的價值體系中，全盤否定了原初的情感價值，伯爵夫人的認知中物品已經脫離了過去，不再受過去的記憶叨擾。從大使那邊收到這份禮物時，珠寶對她而言的意義是全新的，是愛情的涵義填充其中。第二次的贈禮早已抹去第一次贈禮的意義了。

閱讀《伯爵夫人的耳環》時，直覺聯想到一種「多餘」、「剩餘」、「殘餘」的感覺。卻是以這種「餘」的姿態，這對珠寶不斷回返原先的位置，顛擾原本的系統，使原本的意義不斷分裂，甚或原先的意義與衍生的意義重疊，產生系統的不相容。如何以「餘」的觀點來觀看這本小說？原本是多餘，多餘的相反是不足，是匱乏，珠寶再度回返時，卻因為餽贈者不同，填補了原先的空缺，然而珠寶如果填滿了空缺，它的內在性質卻已經不再相同，從婚姻合法的物件，

轉變成婚外情的愛情證物，同一物件卻承載著雙重的意義，而且這雙重意義彼此還矛盾、不相容，最終悲劇收場。珠寶與人際的關係始終無法擺平，始終擺盪在匱乏與超出的尺度之間。

耳環送給了姪子的家族，事情看似告一段落了，塵埃落定，過沒多久又出現戲劇性的轉折。伯爵夫人看到珠寶再次出現在她眼前，因為她的姪女前來請她買回，換得現金或許才能幫助他們走出破產的危機。

小說家的想像力一直圍繞著這副一開始就被定位成多餘的耳環而不斷纏繞，不斷地拋出，卻也不斷地迴返。在前一個階段，珠寶已經正式的「移轉」給另外一個家族，透過公開的儀式，變成了另一個家族的資產，照理說，珠寶已經置身不可變賣、不可毀損的物件行列之中，故事或珠寶的命運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然而，小說家的想像力便是驅動這珠寶「漂流記」的動力。一開始，作家便是用想像力讓一件原本應該不動如山的珠寶「離家出走」，安排女主角選擇這個新婚的禮物拿去典當，變換現金。如今又是以同樣的想像力讓一個已經塵埃落定的珠寶再次回返到女主角身邊，彷彿沒有誰能夠留住珠寶。珠寶到了誰的手上就變成一種多餘，有時候是一種「燙手山芋」，有時候是可變賣的解危的物品。然而，要如何解決這種重複多餘的歷程？這關係到小說家如何安排劇情，尤其如何安排這個物品的命運，而這個物品的命運則又映現出女主角的命運。故事的結尾是，女主角因為自己的戀情撲空，無法獲得大使的諒解，過度傷心引發心病，憂鬱而死：

躺在自己的病榻上，雙手一攤，吐了最後一口氣死去。半張開的手掌中現出那一對心型的耳環，彷彿她想要把這一對心交給某個陌生人。大使與伯爵先生彼此互看了一眼。「她死了，你把這一顆心拿走吧，」伯爵先生說，「另外一顆心是她的，由我保管」。大使拿走了伯爵夫人遞給他的這顆心，沒有多作停留就離開房間，請人載他去找珠寶商：「請把這顆心鑲到一條金項鍊，」他說，「把這條項鍊戴到我的頸部，我一刻都不能等。」沒多久，他回到家，發號了一些命令，請人家整理行李，寄了一些電報，離開那一座城市。（薇慕韓 61-62）

到目前為止，耳環一直都被視為獨一無二的物品，至少是從商品體系中來看。在此耳環被永遠分開，變成兩件獨立的珠寶，共同指向對同一個人的記

憶。將耳環分離，也標示出這件珠寶最後的旅程，物品最後的結果也同樣映現出個人最後的結局。耳環分開變成兩件獨立的珠寶，轉變成一種聖物，一種「人」、「物」合一的物品，而聖物的意思並不是說物品召喚人物的行徑，而是在於「物品曾經屬於某人，這個物品也保有此人的痕跡、蹤影，也與此人維持著一種聯繫」。(Heinich 28)至此，原本是剩餘的珠寶，如今進入到聖物的行列，從「剩」轉「聖」，不再受制於紛紛擾擾的人際關係或社會規範。

轉入轉出之間，珠寶的身分可說完全改變了，大使送給伯爵夫人同樣的珠寶，但是與之前的價值已經不一樣了。當大使贈送耳環給伯爵夫人時，珠寶已經撤除了它自己的過去。數量上來說，珠寶還是一樣的，但就象徵層面來看，珠寶已經不再是以前的珠寶了。一個戒指——一個手環——原本可能只是一家工廠或工匠製造出來要來買賣用的。如果戒指變成一個婚姻的締結物，它的本質就變得不一樣，它變成了一個某種特殊背景下的禮物，如果硬是要抽離，它會變成另一種物品。這種禮物或許可稱之為「述行」禮物，意即這種物品的轉手或交易，通常伴隨著一些正確的通關語，放置在某類型的背景場合之中，有助於夫妻關係的締結，而這手環日後也將表徵或體現這段關係。⁸物品之所以變成結婚禮物，或能夠體現這段婚姻關係，正是因為通過餽贈行為，遵守某些儀禮規定而產生。珠寶的特殊性並不來自其本身不變的珍貴性，而是來自它與某段個人小史有關的連結。《伯爵夫人的耳環》所闡釋的意涵就是一種「述行」禮物的概念。

結論

一般認為，像珠寶這一類物件是用來執行某些目的，比方說，建立關係、締結友誼。然而這樣的說法往往否定了物件在輾轉曲折的路徑中所累積或殘餘的意涵，以及隨著物件轉入轉出所承載或釋出的意義。《伯爵夫人的耳環》所隱含的意義就在於此，或許也可以用這段巴贊的話來理解：「餽贈，或甚至回饋（自行收藏、典藏收集）都是一種行為或事件，禁止把物品淪降為價值或符號。物品似乎展現了自己的抵抗力，展現自己的力量。只要把一個普通或平凡的東西拿來贈送，這個物品就會變成一件獨一無二的東西，在某些場合，甚至可以代表我個人，或成為我個人的見證。使物品具有生命力的，正是餽贈。因

⁸此處「述行」禮物的概念是借助奧斯丁（John Austin）的述行語言的理論，亦即闡述說話的同時也是在做事；說話就是行動本身，說某些話就是做某些事。可參考奧斯丁，《如何以言語行事》。

此，並不是物品本身有甚麼靈性，於是想把它拿來贈予某人。」（12）

「使物品具有生命力的，正是餽贈」。或許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解釋，是餽贈的場合、背景、脈絡……。對女主角而言，這對心型耳環原本是丈夫在結婚隔天贈送的物品，由於這只是一場門當戶對的聯姻，珠寶並沒有被賦予甚麼情感的意涵；這也解釋為何女主角可以因為債務纏身便把這對耳環變賣掉；然而，同樣的一對珠寶由一位心儀的男子贈送，卻因為新的餽贈行為而產生前所未有的內涵。成為禮物，並不是因為我們賦予某一物件某種價值，而比較是因為某種特殊的行為或行動而產出某種意義，就好像劇中女主角曾被迫以一種公開的、儀式性的場合將珠寶送給姪女。因此可以對照一下贈禮的行為有何不同：大使的贈送珠寶賦予珠寶一種情感的眩染，而丈夫的贈送行為只不過是一種約定俗成、合乎禮儀的行為。即便從物質性來說，這對耳環不見得是最能夠表徵愛情的強度，對女主角而言，正因為是大使贈送而賦予一種愛情象徵的意涵。物品會載入意義，也會洩出意義，隨著物品在人類手中轉出轉入，小說家將這一多餘的物件作為敘述的驅動力，同時玩弄了「餘」的雙向意義：既是「超出」，也是「匱乏」，珠寶擺盪在這「剩餘」與「多餘」的辯證意涵之中，映現著愛情與人類難以磨合的關係。

引用書目

中文書目：

薇慕韓著，胡品清譯，〈某夫人〉，收錄於《秋之奏鳴曲》。台北：水牛，
(1986) 2008。

奧斯丁著，張雅婷、邱振訓譯，《如何以言語行事》，台北，暖暖書屋，2019
年。

外文書目：

Barb ris, Dominique, «*Madame de de Louise de Vilmorin*», *Revue critique de
fixxion fran aise contemporaine*, 2012.

Bazin Jean, « La chose donn e », *Critique*, 596-597,1997, pp. 7-24,.

Bonnet, Thierry, « Qu'est-ce qu'un objet pr cieux ? Au sujet d'un roman de Louise
de Vilmorin », *Ethnologie fran aise*, Vol. 36, No. 4, 2006, pp. 723-733.

Bothorel, J.(1993), *Louise ou la vie de Louise de Vilmorin*, Paris, Grasset.

Duchet, Claude, « Roman et objets : l'exemple de *Madame Bovary* », in *Travail de
Flaubert*, Paris, Le Seuil, coll. « Points Essais »,1983 (1969), pp. 11-43.

Elias, N.(1969), *La soci t  de cour*, Paris : Calmann-L vy.

Haroche-Bouzinac, G. (2019), *Louise de Vilmorin Une vie de boh me*, Paris,
Flammarion.

Heinich, Nathalie, « Les objets-personnes ? F tiche, relique et oeuvre d'art », *Sociologie de l'art*, 6 : 25-55.

P raud, Alexandre, «Les trois odyss es extra-conjugales d'un diamant (le ons
compar es d' conomie moderne)», *Revue d'Histoire litt raire de la France*, vol.
114, 2014, pp.183-199.

Vilmorin, L. (de)(1951), *Madame de...*, Paris, Gallimard, coll. « Folio ».

Wagener, F. (2008), *Je suis n e inconsolable: Louise de Vilmorin, 1902-1969*, Paris,
Albin Michel.

Darrieux, D.(2003), *Danielle Darrieux: filmographie comment e par elle-m me*,
Paris, Ramsay.

電影：

Ophüls, Max (réalisation), *Madame de*, scénario de , Marcel Achard, Max Ophüls, Annette Wademant, 1953.

本論文於 2020 年 10 月 5 日到稿，2020 年 11 月 2 日通過審查。